

红色笔记本

真实的故事

The Red Notebook True Stories

Paul Auster 保罗·奥斯特 著 小汉 译



凤凰传媒
译林出版社
出版集团

红色笔记本

真实的故事

保罗·奥斯特著 小汉译

凤凰传媒
出版集团
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色笔记本:真实的故事 / (美) 奥斯特(Auster,P.)著;小汉译. —南京:译林出版社, 2009.1
书名原文: The Red Notebook
ISBN 978-7-5447-0721-3

I . 红… II . ①奥… ②小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50697号

The Red Notebook: True Stories by Paul Auster
Copyright © 1992, 1995, 2000, 2002 by Paul Auster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
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
Bilingual (Simplified Chinese and English) edition copyright ©
2008 By Yilin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0-2007-127号

书 名 红色笔记本
作 者 [美国] 保罗·奥斯特
译 者 小 汉
责 任 编辑 周丽华
装 帧 设计 丁威静
原 文 出 版 A New Directions, 2002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电 子 信 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http://www.yilin.com
集 团 网 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 6.75
插 页 4
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0721-3
定 价 21.00 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I	红色笔记本	001
II	为什么写作	047
III	事故报告	065
IV	没多大意思	075

Contents

I	The Red Notebook	091
II	Why write?	149
III	Accident Report	171
IV	It don't mean a thing ...	185

红色笔记本

I

1972年，我的一个好朋友惹上了点法律麻烦。那年她在爱尔兰，住在离斯莱果镇不远的一个小村庄里。恰好是我去探望她的那天，一位便衣警探驱车来到她的小屋，向她呈递了法院传单。由于对她的指控严重到需要雇律师的程度，我的朋友于是四处打听，找到了一名律师，第二天我们就骑车进城找他讨论案情。使我吃惊的是，他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居然名为“阿戈尤与菲卜斯”^[1]！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如果有人怀疑我，我敢

[1] 原文为 Argue and Phibbs，与英文中“争辩与谎言”(argue and fibs) 谐音谐形。

挑战他们自己去斯莱果看看我有没有胡编乱造。这二十年来，我爱死了这两个名字，可即便我能证明“阿戈尤”与“菲卜斯”确有其人，我还是很难相信这两个名字竟会摆在一块儿，构成这样一个绝妙笑话，一个对律师行业的彻底讽刺。

根据最近一次的消息（三四年前），这家事务所生意还很兴隆。

II

接下来的那年（1973），我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份守护工作。我那位朋友的法律麻烦也早抛在了身后。我们之间时好时断的情侣关系好像又热乎起来，于是决定联手接受这份工作。当时我们的钱都用光了，没有这份工作就只能回美国——

而我们谁都没打算回去。

那真是古怪的一年。一方面,那地方很漂亮:一栋十八世纪的大石屋,一边挨着葡萄园,另一边是国家森林公园。最近的村庄在两公里外,可居民不到四十人,每个人都至少有六七十岁。两个年轻作家在这里呆上一年是最理想不过的,L 和我勤奋工作,工作成绩远超我们的预想。

另一方面,我们总是生活在灾祸边缘。我们的雇主,一对住在巴黎的美国夫妇,每月给我们寄一小笔工资(五十美元),一份汽车的油费开销,还有给农场两条拉布拉多猎犬买狗食的钱。总的来说,这是挺慷慨的安排。不用付房租,工资虽不够过活,但可以用来提前应付每月的开销。我们的计划是做翻译工作来挣足剩余的费用。在离开巴黎来乡村安顿下之前,我们就找好了几份足以支撑全年的活儿。然而我们疏忽未加考虑的是,出版社在付款的时候经常延误。我们还忘了考虑到,从一个国家寄到另一个国家的支票要花上好几个星期才能兑现,而且在兑现时,银行又要从支票总数里扣掉一些手

续费和兑换费。由于计算时没留下什么误差的余地,我们经常发现自己处在绝望的困境中。

我记得曾在烟瘾凶猛发作时,全身因渴望尼古丁而发麻。我在沙发垫子中间翻耙,又爬到橱柜后面,四处搜寻散落的零钱。花上十八个生丁(约合三分半美分)你就可以买到一包牌子叫“巴黎女人”的香烟,每包有四支。我记得曾在喂狗时心里嘀咕,它们吃得比我好。我记得曾和 L 正儿八经地讨论开一听狗罐头来当晚餐。

那年我们的另一份收入来源,来自一个叫约翰·糖^[1]的人(我并没打算用这些一语双关的人名,可事实就是事实,我也没办法)。糖是《国家地理杂志》的摄影师,当时他与我们的一个出版社在合作一篇与当地有关的文章,从而走进了我们的生活。他开一部杂志社提供的汽车,花好几个月时间在普罗旺斯兜转拍照。每当他来到我们的这块山林,他

[1] 原文为 Sugar。糖在英文俚语里有“钱”或“富有”的引申意,如“sugar daddy”。

就会来住一晚。因为杂志社还给了他一个工作费用的开销帐户，他会很慷慨地把原本要用来住旅店的钱塞给我们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一个晚上能有五十法郎。实际上，L 和我变成了他的私人客栈老板。在这桩买卖上，糖是个好说话的人，因此 L 和我都很欢迎他来。唯一的问题在于，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。他从来不事先打电话，经常好几个星期也不光顾。我们于是学会了不依赖糖先生。他会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，把那发亮的蓝色汽车停在房前，住上一两晚，然后又消失了。每次他离开，我们都假设那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。

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在冬末春初。支票没寄到，一条狗被偷了。一点一点地，我们吃光了厨房里的储粮。最后，我们只剩下了一袋洋葱，一瓶食用油，还有一袋别人买的，我们搬进来前就有的馅饼面料——那是去年夏天剩下的，已经发了霉。L 和我整个早晨都忍着不吃，一直挨到下午。可到了两点半，饥饿还是战胜了我们。我们走进厨房，开始准备我们的最后一顿饭。基于原料的缺乏，洋葱馅饼是

唯一可做的菜。

我们把拼凑炮制出的那个东西放进炉里烤了一阵，觉得差不多了，便把它取出来放在桌上，开吃。出乎意料，我们俩都觉得它非常好吃。我们甚至把它称为是我们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，可毫无疑问这是自我欺骗的一个伎俩，是鼓励自己的一个微弱努力。多吃了几口后，我们就开始失望了。不情愿地，非常不情愿地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馅饼还没烤透，中间还是凉的，没法吃。没有其它办法，只能把它放回炉里再烤十或十五分钟。考虑到当时我们有多饿，考虑到我们的唾液腺才刚刚被激活，再把它放回去是多么不容易啊。

为了平息焦躁的心情，我们出门散了一会儿步，心想着如果不在厨房里闻着那诱人的香味，时间或许会过得更快些。我记得，我们绕着房子走了一圈或是两圈。我们不知怎的谈起了一个深刻话题（不记得是什么话题了），可无论是如何发生的，也无论我们走开了多久，反正等我们再进屋的时候，厨房里已经充满了焦烟。我们冲向炉子把馅饼拉出

来，可已经太晚了。我们的馅饼大餐已经死掉了。它已经被火化成一堆黑乎乎的炭状物，连一小口也没能抢救下来。

这故事现在听起来也许很滑稽，可当时一点也不好笑。我们掉进了一个黑洞，谁也想不出一条出路。在我努力成为一名男子汉的这些年来，我想不出还有比那时更不想笑，更不想逗趣的时刻。那真是个绝境，是一个可怕的、恐怖的所在。

那是下午四点钟。不到一个小时后，飘忽不定的糖先生突然出现了，开着车在尘土飞扬中来到了我们房前，从头到脚都是泥沙。如果我用力回想，我还能看见他跳下车来对我们说哈罗时，脸上那天真憨厚的笑容。那是个奇迹。一个真实的奇迹。我亲眼见到，亲身经历。在那以前，我一直以为这种事只在书里才有。

糖在那天晚上请我们去了一家两星级餐馆吃晚饭。我们丰丰富富地吃了一顿，喝光了好几瓶葡萄酒，笑得前仰后翻。可是，尽管那些食物肯定很美味，我丝毫不记得它们的任何细节。而我从来不曾

忘记那个洋葱馅饼的味道。

III

我回纽约不久后(1974年7月),一位朋友就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。故事发生在南斯拉夫,时间应该是二战的最后几个月。

S的叔叔是塞尔维亚一个纳粹抵抗组织的成员。一天早晨,他和他的同志们从睡梦中醒来,发现自己被德军包围了。他们被困在乡下的一个农庄里,地上积雪有一英尺厚,无路可逃。想不出其它办法,他们于是决定抽签。他们的计划是一个接一个地冲出去,从雪地里突围,看看能不能找到生路。根据抽签结果,S的叔叔应该在第三个出去。

他透过窗户看着第一个人奔向了冰雪覆盖的

野地。机关枪声接二连三地从对面的树林里扫出，那个人躺下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第二个人跑出去，同样的事发生了。机关枪响，人仆倒，死在雪地里。

轮到我朋友的叔叔了。我不知道他在门口时是否有所犹豫，也不知道那个时刻他脑海里激荡的是什么念头。我的朋友只告诉我，他的叔叔开始奔跑，用尽他全身的力气在雪地里飞奔。他感觉跑了有永远那么长，然后忽然间，他感到腿疼，一秒钟后，一种无法抗拒的温暖流遍他全身，又过了一秒钟，他失去了知觉。

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仰天躺在一辆农夫的木车里。他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救的。他只是睁开了眼睛——自己躺在一辆马儿或驴子拉着的木车里，木车走在乡村小路上，而他只能看见农夫的后脑勺。他才研究了那个后脑勺几秒钟，树林里就传来巨大的爆炸声。他没力气挪动，只好继续盯着那后脑勺，可突然间它就不见了。它从农夫的身上飞掉了，刚才还是一整个人，现在是一个没有头的人。

更多的爆炸声，更多的混乱。马儿是否还继续拉着木车走，我没法说，但就在那几分钟，或几秒钟内，大批的苏俄军队从路上滚滚而至。吉普车，坦克车，一排排士兵。指挥军官看了一眼 S 叔叔的腿，立刻把他发送到临近设立的战地医院。那只不过是个破木房——也许原来是养鸡棚，或是某个农庄的附属建筑。俄国军医宣布那条腿已无法挽救。伤势太重，他说，只能把它切除。

我朋友的叔叔开始号叫。别锯掉我的腿，”他喊道，“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别锯掉我的腿！”可没人听他的。医护人员把他固定在手术台上，医生举起了锯子。就在他准备往腿上切下的时候，又传来一声爆炸的巨响。病房屋顶轰然落下，墙壁倒塌，整个地方被夷为平地。S 的叔叔再次失去知觉。

这次他醒转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。床单干净柔软，房间里有股好闻的味道，而腿还长在自己身上。过了一阵，他看见一张美丽的女人的脸庞。女人对他微笑，用勺子喂汤给他喝。毫不知情地，S 的叔叔又被救了一次，被转移到另一个农庄。